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40,000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ISBN 7-218-00613-2/K·133

*

定价：3.80元

目 录

回忆与怀念

-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曾 生（1）
- 回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连 贯（30）
- 回忆“九·一八”后在上海参加共青团活动……………郑星燕（38）
- 挺进粤湘边（下）……………周 明（73）
- 湘南行 ……………陈遐瓚（106）
- 粤东之春（上） ……………铁 坚（112）
-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青妇组的青年
 工作活动 ……………黄焕秋（157）
- 回忆海陆丰社会主义青年团
 组织经过概况 ……………林务农（164）
- 永恒怀念尚仲衣同志 ……………杨康华（178）
- 松柏常青 功在人寰 ……………罗亚辉（184）
 ——深切怀念陈坦同志
- 透过海口谈判认识韩练成 ……………史 丹（196）
- “大旗由我担，家由他们当” ……………朱小仲（206）
 ——抗战期间的黄桐华与莫雄

党史专题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党的
 白区工作 ……………叶文益 杨 建（216）

红军和陈济棠秘密谈判……………陈 理 (244)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李济深的

统战工作……………卢 荻 (253)

革命报刊介绍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陈登贵 (275)

著名革命刊物《新青年》……………林锦文 (283)

《岭东民国日报》……………江铁军 (29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广东省委报刊简介……………官丽珍 (301)

问题考证

李之龙有没有退党? ……………卢 权 (312)

翻译资料

陈独秀在广州 (1920—1921)

……………〔日〕村田雄二郎著 刘助仁译 (316)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

曾 生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斗争革命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有关“一二·九”运动在广州的情况，许多同志写了不少文章，不再作赘述。这里仅就几个印象较深的问题作点回忆。

一、“一二·九”运动前夕广州的学生运动

1933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怀着追求进步、向往未来的激情，直升到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读书。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华南最高学府。它的前身叫广东大学，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为中山大学。该校在大革命时期，就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党员六、七十人；1926年，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员300人左右。有许多学生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著名的北伐战争。这时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德珩等革命文豪和著名学者，先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或讲课。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随即于4月15日在广州、汕头等地进行

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中山大学的革命力量横遭摧残，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遭受反动派的无理逮捕和杀害。鲁迅先生为此愤然辞去该校教务长职务，赴香港转上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血腥统治，广州地区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各种进步团体都遭到极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到我进中山大学读书时，广州已经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但仍有何思敬^①、何干之和邓初民等个别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党员和进步教授在青年学生中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

“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一段时间，广州的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面目还认识不清，总希望他抗日。然而，蒋对外一直是军事上撤退，外交上妥协；对内则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事实教育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逐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他们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在这社会黑暗，民族危亡日益深重的时刻，广大的爱国青年不断地追求进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个别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影响和教育下，思想上有很大的进步，在行动上搞抵制日货运动，进行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募捐和抗日宣传活动。1932年春节前后，我们中大附中的学生还组织过下乡宣传活动。与此同时，他们纷纷组织读书会、文艺社团等形式的进步群众团体，秘密进行活动。这些组织有的三、五个人，有的10多人自行结合，各自开展活动，各不相属。1932年下半年，我还在中大附中读书时，就与附中同学钱兴、粟稔、韩瑶初、钟远蕃、罗宗皇、禡万和、张凤楼、黎伯枢、陈培

^① 何思敬，1932年5月，在上海由沈志远、韩托夫介绍入党。

迪、黎元杰等10多人开始成立了学习进步书籍的读书会。据后来了解，在中山大学、勸勤大学、广东省立一中（广雅中学）、执信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都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学习革命书刊，交流学习心得，甚至出版进步刊物。饶彰风、杜埃出版了一个叫《天皇星》的进步文艺刊物。1933年至1935年间，从上海、北平、香港等地经过各种途径和书店，大量的进步书刊在广州发行。如《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文学月报》，特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书，都是当时进步青年喜欢的读物。我们读书会平时各自阅读进步书籍，定期交流学习心得，讨论时事。每周进行一、两次讨论会。为研讨救国的真理，我们经常从书本上的理论问题联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在1933年前后，我们读书会曾多次请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何干之（当时叫谭秀峰）参加我们在惠如茶楼等地举行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等问题的讨论会。何干之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精辟分析，对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很有帮助。后来我们这个读书会的成员都直接升上中山大学的大学部。我和粟稔、罗宗皇、灞万和等读文学院；钱兴、韩瑶初、钟远蕃等读法学院。绝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成为“一二·九”运动中广州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在读书会的成员中，钱兴对我的影响和帮助最大。每当我回顾青年学生时代的情景时，脑海里总会出现钱兴的高大形象。

钱兴，原名钱发年，广西怀集县（现属广东）诗洞人。由于他为人正直，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在家乡读初中时成绩优秀，深得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共产党员）梁一柱的赏识。在梁老师的教育下，钱兴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立志日后要为救国救民，以复

兴中华为己任。因此，他后来到广州读书时，即取名为“兴”，表示毕生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他1930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广州知用中学读高中。翌年，又转考入中山大学附中高中。从此，我们开始一起阅读进步书籍，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外形势和国家、个人的前途，以及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等问题。钱兴后来成为中山大学“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的负责人和广州“一二·九”运动的一位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因工作需要，在1937年三、四月间，接受党组织的委派，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决定派钱兴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并担任工委书记。后因广西党组织被叛徒出卖而遭受破坏，致使广西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钱兴一方面坚持党的独立工作，一方面积极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钱兴这段时间的工作，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的肯定和赞许。解放战争时期，钱兴担任中共西江工委副书记。

1934年冬，有一天钱兴高兴地告诉我，他已找到了一位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的共产党员。这位党员由于没有组织关系，他暂时还不能介绍新党员入党，所以不能建立党组织。现在，他已组织了一个进步的革命秘密组织，叫“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表示同意。于是钱兴就介绍我参加了“中青”。

“中青”的发起和组织人是王均予。王是上海党中央秘密刊物的发行工作人员。他在发行工作中以“读者会”的形式同一些进步青年建立了联系。由于上海党组织受破坏，他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从上海来到广州，找到勤勤大学的学生、“读者会”的会员邱萃藻。在邱的支持下，王均予在广州又开始了革命工作。王均

予通过邱萃藻认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在广东建立起“中青”组织。他首先在中山大学、勸勤大学吸收了邱萃藻、钱兴等人参加。随后，以中山大学、勸勤大学和国民大学为主要阵地，在中大附中、勸大附中、广雅中学、女子师范、执信中学、知用中学、市一中及燕塘军校等广州学校都发展了“中青”的成员或组织。同时，还在东莞、中山、新会、肇庆等地先后建立了“中青”的组织。到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前夕，“中青”成员已发展到100多人。“中青”成为发动和组织“一二·九”运动中广州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中山大学和广州市的部分大、中学校的一批进步青年，也先后成立了“突进社”、“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力社”等党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也是“一二·九”运动中广州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或骨干。

“中青”是以党的宗旨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一个党的外围秘密组织。参加“中青”必须是政治面目清楚，信仰共产主义，严守组织纪律的进步分子。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地下秘密组织。组织成员之间是实行单线联系的。中山大学的“中青”支部，当时我只知道钱兴是负责人，由他与我单线联系。后来，我才从钱兴那里和李驹良、钟远蕃的回忆文章以及广州市青年运动史的资料中，了解到中大“中青”支部的成员有钱兴、粟稔、李驹良、金昌华、韩瑶初和我等人。

1934年冬，由于一批进步师生的信任和支持，我担任了在中山大学附属小学举办的中山大学贫民夜校的校长。黄焕秋、刘秉钧等进步同学担任教员。学生有二、三百人。该校不仅为贫苦大众子弟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机会，而且成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场所。我参加了“中青”之后，组织分工是要我办好这间贫民夜校，以夜校为阵地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中青”为了组

织和领导中山大学乃至全广州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有一个进行组织秘密活动的场所。我就以中山大学贫民夜校校长的名义，以教师中午或晚上休息的需要为理由，向学校当局要了几间木屋，作为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场所。我们就在这里油印宣传品和筹划学生运动。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前广州的青年学生运动，由于当时主要是靠党的政策的影响和个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和进步教师的积极宣传、组织和指导，还没有党组织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所以，这时期广州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各种力量比较分散，仍未能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但是，在努力探索救亡的道路，逐步组织力量，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这个总方向是对的。它为“一二·九”运动中广州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动和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二、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 中大“双十二”示威游行

1935年秋，日军在华北侵略活动加紧进行，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也随之逐渐高涨。八、九月间，广州的进步青年从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提出我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更明确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向。“中青”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中青”的组织和成员，根据我党的抗日主张，加紧工作。中大的“中青”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加紧在校内进行活动，通过各种宣传形式来

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推动抗日斗争。当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把载有抗日救亡或日寇侵略消息的报纸剪下来，加以编排，用红笔加上醒目的标题，秘密地在宿舍、饭堂、阅报室张贴。这些剪报两、三天出一次，对同学们有很大的鼓动作用。有时也编写一些壁报，其中有一篇集体创作的《抗日问答》吸引了很多的观众。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又不断印发油印报，登一些较长的长章，把党的抗日主张，用通俗的文字改写后，刻印出来。钱兴对这工作十分重视，并亲自去做。这些工作是在非常机密、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白天黑夜地干。有时在白天没有刻写蜡板的适当地方，就到石碑的茶山去干。这座山在石碑中山大学附近，站在山顶能看得很远，有不可靠的人走来时，可以及时转移或隐蔽。钱兴就经常在这里赶刻宣传抗日的文章，他以石头做桌子，坐在地上刻，在烈日下经常一刻就几个钟头。这些宣传品的印刷，多数是在我们贫民夜校教师休息的木屋里进行。这些油印报，在中大和其他学校的进步同学中流传相当广泛，对激发广州地区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推动抗日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一天晚上，钱兴找我研究如何贯彻上级要我们动员同学们起来反对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指示问题。他认为，目前我们除了继续做好宣传工作之外，应立即开展组织工作。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经过紧张的工作，在中大文学院的社会系和教育系三年级、法学院法律系四年级、政治系三年级分别成立了抗日会。他们发表宣言，号召全校同学立即行动起来，联合全校和全市各学校的师生共同奋斗。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在钱兴等进步同学的发动和组织下，还在石碑中大校内举行了一次抗日游行。这几个班的抗日会是后来的中大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的先行组织，

也是广州“一二·九”运动的滩头阵地。同时，各进步团体还请进步教授邓初民、何思敬等举行抗日讲演会。经过这些活动，广大青年学生日益觉醒起来，积极要求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九”抗日示威大游行的消息传到广州时，在石牌的中山大学学生立即轰动起来。他们激动地奔走相告，各宿舍、饭堂门前到处出现了加上红圈和鼓动口号的剪报墙报，报道北平学生示威的情况，号召同学们即刻行动起来。

10日晚上，中大全校各班的代表在文学院宿舍召开会议，讨论全校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召开全校抗日大会问题。这次会上进步同学和中大校董、民政厅厅长林冀中操纵的“抗声社”^①成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抗声社”成员不愿意召开全校的抗日大会和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提出以班代表会议的名义发表宣言，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企图以此阻挠中大大规模地开展抗日运动。但是中大进步同学早就估计到“抗声社”成员可能会阻挠中大抗日运动的开展，于是，在那天晚上班代表会议期间动员了许多同学在会场周围旁听，一致呼吁代表们必须通过决议，在翌日（11日）上午召开抗日大会，大规模地开展中大的抗日运动。在群情激昂的压力下，班代表会议一致决定在11日举行全校大会，使

^①当时，陈济棠标榜自己主张抗日，故林冀中把他的御用组织称“抗日之声社”，简称“抗声社”。

“抗声社”成员不敢提出反对的意见。

据“抗声社”成员李树写的材料记载：“抗声社”是林冀中想兼任中大校长，指使他的爪牙张仲绛等人在中大组织的一个半公开的所谓“抗日”群众团体的御用组织。在中大的活动主要是由中大助教“广东地方自治人员训练所”负责人张仲绛主持。它经常研究如何在各系竞选各年级、各班的代表和各系所组织的学术性质的研究会、各地方的同乡会等组织的代表，企图把持这些组织的领导权，逐步争取广大师生的支持，把邹鲁赶下台，由林冀中兼任中山大学的校长。1936年陈济棠倒台之后，林冀中、张仲绛相继出国而“抗声社”也自动解体。在“一二·九”运动前夕，“抗声社”在中大网罗的人数不少，分布在全校各个学院，各系许多班的班代表都是他们的人。当北平“一二·九”运动消息传来广州，中大學生大规模的抗日运动兴起时，他们立即开会，“研究如何争取大会的主席，操纵大会，使运动不致扩大”。

10日深夜，文学院、法学院几个班级成立的救国会和各院系的进步同学组成了“夜呼队”，每队约二、三十人，分别到文、法、理、工、农各学院的宿舍前，齐声高呼：“明天上午在大礼堂开抗日大会，请同学们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不落后人！”宿舍里的学生有的已经睡了，也从床上爬起来鼓掌响应，并高呼抗日口号，此起彼落，非常热烈。

11日早，中大各学院的学生纷纷向大礼堂集中，在市内的医学院和附中也派代表参加，一共30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抗日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通电全国，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吁请政府领导抗战，决定12日到广州市举行示威游行的决议。但这次大会“抗声社”成员按照其主子的旨意，竭力篡夺抗日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事先串通好，彼此提名文学院的“抗声社”骨干李树

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不经大会通过便走上主席台去。“抗声社”成员把持了中大抗日大会主席团的席位，对中大和整个广州的学生抗日运动都起到了阻挠和破坏的作用。

12月12日上午，中山大学学生3000多人的抗日游行队伍，由农学院教授张农率领，从石牌浩浩荡荡地向市区进发。当游行队伍经过沙河、黄花路到达东山时，医学院和中大附中的3000多学生参加进来了。6000多人的抗日示威大军象一股洪流涌向市中心。由于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使得每一个具有爱国良心的中国人民都积压着无限的悲愤要求发泄出来；又由于事前做了大量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所以，中大的学生几乎全部都参加到游行的队伍。游行队伍以“国立中山大学抗日示威大游行”的门旗为前导，同学们迈着有力的步伐，手持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全国一致抗日！”等抗日救国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队伍经过马路时，许多民众站在两旁以兴奋赞同的目光凝视着，壮烈的口号声、歌声扣动着每个人的心弦，有的群众还向队伍热烈欢呼鼓掌。当游行队伍经过长堤，进入六二三路，同学们脚踏着帝国主义曾经屠杀过中国人民的马路时，当年“沙基惨案”的情景立即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面对着帝国主义分子霸占的沙面租界区，同学们义愤填膺，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等口号，两旁的群众一齐高呼口号，对示威游行队伍热烈鼓掌。示威游行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中大的学生徒步回到石牌时已夜幕降临。

中大学生的“双十二示威”大游行，打破了广州几年来抗日运动沉寂的空气，使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走向一个高涨的时期。

三、争取学运领导权的斗争 第二次抗日示威大游行

中大“双十二”抗日示威大游行之后，“抗声社”成员原以为发表了宣言，举行了这次游行就算了事。可是，游行之后，广大同学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高涨，纷纷要求再开大会，扩大抗日运动。这时，“抗声社”成员眼看无法控制局势，害怕运动进一步扩大，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在11日的全校学生抗日大会上，曾决议自动停课一周，联合全市学生自动停课宣传，联络全市学生扩大示威游行。对于大会决定要做的工作，把持中大抗日大会主席团的“抗声社”成员消极怠工，不予执行，只由积极抗日的进步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到市内各学校进行联络和宣传讲演。从13日至16日，中大同学组织宣传队扩大抗日宣传，分为5个大队，133个小队，每队设队长1人，队员10多人。他们分头到广州市的主要街道、中央公园、近郊芳村和佛山等地进行演讲和张贴抗日标语等活动。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广州市学生的抗日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个宣传队、联络队在群众和各学校中更广泛深入地播下了抗日的种子，不少学校如勸勤大学、广雅中学、市立女子师范等纷纷起来发动抗日救亡运动。

对于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怕得要死，急忙于15日下午2时，在省参议会礼堂召集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拼凑成立御用组织“广州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推出市一中代表梁祖翘为主席团主席。他们鼓吹“读书救国”，妄图瓦解爱国学生的斗志，还指使中大“抗声社”成员竭力把持中大抗日大会的主席团，敷衍群众，阻挠运动。在其主子的指使下，“学联”照例召开所谓“抗日”会议，国民党

省党部和教育厅的大员出席训话，胡说什么“游行无济于事”，“有效的抗日就是埋头读书”。他们拒绝中大学生代表出席会议和介绍示威游行的经过。反动当局还布置各校的校长“要管好学生，不要让事态扩大”。于是，广雅中学学生开展救亡运动，被学校当局禁止。知用中学一些班级开抗日会，被校方勒令解散，发起人受记大过处分。政府当局还下令规定学校组织抗日会，要经国民党党部批准。同时，反动当局为镇压和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而拼凑的所谓“广州市学生救国会”，在一些大、中学校也设立了御用“救国会”，这些傀儡组织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把持。这些组织的头头平日专门打听进步学生的活动，给反动当局送情报；当学生爱国运动高涨时，他们又利用“救国会”的招牌来竭力进行破坏。我们中大学生联络宣传队的工作，就遭到这帮反动分子的破坏。如中大的联络宣传队到广州法学院进行工作时，这些反动分子公然出来阻挠，不准中大学生进校。但广州法学院的广大学生却不顾这些流氓的阻挠，自动集合起来，热烈欢迎中大的宣传队。“广州学生救国会”的头目、国民党公安局的“侦缉”黄培才更是猖狂，当中大和广州市各校的学生抗日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四处出动，扬言要用手枪来对付抗日运动的积极分子。

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国的抗日运动汹涌澎湃地继续发展。在这形势的推动和鼓舞之下，16日上午，中山大学全体学生再次召开抗日大会，通过了“停课10天，下乡扩大抗日宣传”的决议。这项决议是广东国民党当局授意他们的走卒提出来的。他们为什么提出这表面上看来是扩大抗日宣传运动的提案呢？原来，反动当局看见广州学生的抗日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十分害怕，但一时又不敢采取公开的镇压手段，于是想出一个

“釜底抽薪”的诡计，想假借“下乡扩大宣传”的名目，把各学校的学生驱散到各路去，暂时扑灭广州市这个抗日运动日趋高涨的中心地区的抗日火焰，同时再通过其爪牙破坏各学校到各路的抗日宣传队的工作，指令各路政府和国民党党部禁止学生的抗日活动。“抗声社”成员认真执行了他们主子的旨意，他们一方面赞成停课下乡宣传的提案，一方面又实行怠工，不去组织队伍到各路进行宣传工作，任由学生自流分散回乡。有一些进步学生较多，真正进行抗日活动的宣传队，在各县则遭到国民党党部的恐吓和驱逐。如有一个抗日宣传队在县里进行工作时，该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竟带他们去“参观”县里的监狱，指着那阴森的监狱对同学们说：“你们如果不好好读书，听取政府的约束，而要搞什么抗日运动的话，那你们就要准备尝尝铁窗的滋味。”中大附中有一个下乡宣传队，竟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押解回校。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付爱国青年学生和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是多么阴险毒辣。尽管如此，还有一些进步同学组织的下乡宣传队，在当地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杜埃同志组织领导的下乡宣传队，他们到大埔县后，在当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播下了抗日斗争的火种。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运动的阴谋，继续推进抗日救亡运动，我和钱兴、粟稔、金昌华等进步同学研究当时的形势和如何进一步开展广州学生的抗日运动。我们都觉得广州的运动刚搞起来，为什么“抗声社”突然主张动员全部同学下乡扩大抗日宣传呢？既然他们主张下乡扩大宣传，他们又为什么不去组织同学下乡？这可能有问题。会不会把同学们推下乡去，以此扑灭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呢？为了预防这情况的出现，我们不能下乡，要坚持在广州继续做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当我们分析中大